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主編 / 郝春文

201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主辦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16

201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2016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高田時雄 柴劍虹

策劃

郝春文

主編

陳大為

副主編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8. 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201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 郝春文主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325-8130-6

I. ①2… II. ①郝… III. ①敦煌學—叢刊 IV.
①K870.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30308 號

201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郝春文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敦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8.75 插頁 4 字數 340,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130-6

K·2218 定價: 9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名單：

中 國：樊錦詩 郝春文 柴劍虹 榮新江 張先堂 鄭阿財(臺灣)

汪 娟(臺灣)

日 本：高田時雄 荒見泰史 岩尾一史

法 國：戴 仁

英 國：吳芳思 高奕睿

俄羅斯：波波娃

美 國：梅維恒 太史文

德 國：茨 木

哈薩克斯坦：克拉拉·哈菲佐娃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網頁：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地址：

日本國 京都市 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4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田時雄教授 Tel: 075 - 753 - 699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 - 8265, JAPAN

2016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目錄

學術綜述

2015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1)
2015 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殷盼盼 李曉明(30)
敦煌祆教研究述評	楊富學 蓋佳擇(60)
敦煌講經文研究綜述	魏晴晴(86)
中國大陸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及回鶻經濟史研究綜述	臧存艷(106)

會議介紹

2015 敦煌論壇：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彭曉靜(125)
2015 鎖陽城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莫秋新(135)

西域與東瀛

——中古時代經典寫本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袁 苑(139)
霞浦摩尼教學術研討會綜述	李曉燕(142)

書評

何爲敦煌文獻	岩本篤志撰 田衛衛譯(145)
--------------	-----------------

出版信息

書訊二則	盧雅凝(149)
------------	----------

論文

敦煌文獻 S. 5894 寫卷內容之疑問	胡同慶(150)
----------------------------	----------

學會信息

優秀學術領導人應該具備的品質

——2015 年 8 月 15 日在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上

的講話(節選) 郝春文(155)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第六屆理事會和領導機構成員名單

.....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處(157)

論著目錄

2015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宋雪春(159)

2015 年吐魯番學研究論著目錄 殷盼盼 李曉明(181)

2015 年西夏學研究論著目錄 馬振穎(194)

2012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林生海(206)

2013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林生海(231)

2009 年以來中國大陸敦煌學博碩士學位論文目錄 朱國立(253)

近六十年河西魏晉十六國壁畫墓研究著述目錄 朱國立(278)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294)

2015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華東師範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2015 年度大陸地區出版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 30 餘部,公開發表研究論文 400 餘篇。茲分概說、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書評與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概 說

本年度有關敦煌寫本學與寫本文化、敦煌文獻與中古史研究的關係、敦煌文化概說、敦煌外流文物的考索、敦煌文獻的釋錄與刊布、敦煌研究院院史的回顧、敦煌歷史人物的考述等研究成果較為突出。

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研究開闢了新時期敦煌文獻與中古史研究的新領域,郝春文《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 期)首先追溯了敦煌寫本學的名稱由來及研究史,認為敦煌寫本學是敦煌學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寫本學的組成部分;作者對中國古代寫本學的含義、研究對象、分期及研究內容做了恰當的界定,並對中國古代寫本學與敦煌寫本學的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展望。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和吐魯番盆地的各個遺址發現的文獻,給中古史研究帶來珍貴的新資料。榮新江《從“補史”到“重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 期)論證了敦煌吐魯番文獻具有“補史”和“證史”的重要價值,同時希冀敦煌吐魯番研究在 21 世紀邁出新的步伐,充分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特徵,重構新的歷史篇章。余欣《博物學與寫本文化:敦煌學的新境域》(《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 期)呼籲建立中國乃至東亞世界古代“學”與“術”的整體解釋性框架,探索建立博物學、寫本文化、知識社會史與中外關係史相融合的史學研究新範式。馮培紅《敦煌基層社會史芻議》(《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 期)指出敦煌文書為研究中古基層社會史提供了豐富資料,全方位開展敦煌基層社會史研究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游自勇《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與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 期)從“日常生活史”的視野來關照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並提出了自己的設想。

敦煌文化概說方面,項楚、戴瑩瑩《敦煌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對敦煌文化做了全方位的介紹,包括敦煌在東西文化交流中

的特殊地理位置、輝煌燦爛的莫高窟、精妙絕倫的彩塑、宏偉瑰麗的壁畫、包羅萬象的遺書等，敘述了敦煌在近代遭受的劫難，以及近代以來中國學者為復興敦煌學所付出的辛勤努力等。有關敦煌外流文物的考索，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獲敦煌寫本之外流過程研究》（《敦煌研究》6 期）根據英藏斯坦因檔案資料首次對斯坦因 1907 年 10 月初在安西私購敦煌藏經洞寫本的事件進行了專題研究，並復原了這批文物在隨後外流過程中的路線圖。馬德《敦煌遺書的再度流失與陸續面世》（《敦煌學輯刊》3 期）指出，自 1920 年以後留在敦煌的藏文寫經，最少有 3000 卷左右的卷軸本和 2000 多張梵夾頁流失，雖然這批寫本在近百年來也在陸續面世，但目前所見卷軸本不過四百餘卷，而梵夾頁基本上只有十數頁，繼續搜集這批敦煌寫卷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敦煌文獻的整理、釋錄與刊布在本年度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二、十三卷分別於 2015 年 3 月和 7 月出版，釋錄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所收寫本 S. 2353—S. 2710 號，並對每一件文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介紹和說明。金雅聲、趙德安、沙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冊出版，著錄編號至 5371 號。另由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第十七和十八兩冊，著錄編號為 P. T. 1322—P. T. 1352。郝春文主編《2015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敦煌吐魯番學會 2015 年刊，刊發的學術研究綜述涉及 2014 年度的敦煌學、吐魯番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壁畫兵器、蒙元統治敦煌史、明清時期敦煌史研究等，並有當年相關的學術會議介紹，同時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2010 年至 2011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等。

敦煌研究院年長學者的口述歷史對敦煌研究院院史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石室寶藏牌坊和慈氏之塔原本不在敦煌莫高窟，孫儒儻《莫高軼事·我的敦煌生涯（六）——關於石室寶藏牌坊和慈氏之塔的拆遷與復原記事》（《敦煌研究》5 期）對莫高窟石室寶藏牌坊和慈氏之塔的來歷、拆遷和復原進行回憶和記述，展現了敦煌文物的保護歷程。另外，孫儒儻《莫高軼事·我的敦煌生涯（七）——千相塔殘塑的整理及第 17 窟洪辯像的遷移》（《敦煌研究》6 期）回憶了兩件事情：一是關於王圓籙所建千相塔的拆除時間，以及後來對塔中殘塑的處理；二是藏經洞中的洪辯真身原本存放於第 362 窟中。親身經歷者的記憶也具有傳承歷史的重要作用，劉進寶《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初期的點滴記憶》（《中國文化遺產》3 期）追憶了學會成立時的一些不為

公眾所知的事情。何鴻、何如珍《莫高窟舊影》(西泠印社出版社)收錄了一批拍攝於 20 世紀 40—60 年代的莫高窟原版照片,包括莫高窟各個時期的壁畫、彩塑作品,同時包括部分莫高窟外景照片,對敦煌學的研究和石窟的修復保護均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敦煌地區歷史人物的考述對象,包括漢末的侯瑾和唐末的竇良驥。侯瑾是漢末敦煌地區的隱逸高士和學者大儒。張清文《論敦煌學人侯瑾的形象演變及其影響》(《敦煌研究》4 期)通過文獻分析,並結合歷史背景,論證了侯瑾被神化的原因是前涼統治者為強化自己統治而製造輿論的結果。竇良驥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重要文人,敦煌寫卷中保存有他的十數篇作品,主要以功德記、遜真讚等實用性文章為主。朱利華、伏俊璉《敦煌文人竇良驥生平考述》(《敦煌學輯刊》3 期)通過上述作品考證了竇良驥的生平經歷,從中揭示出吐蕃統治下漢族文人的真實心態。

有關“敦煌哲學”的話題依然在持續。穆紀光《西王母:中華文化東西交流的神話先驅——並論“交流”是“敦煌哲學”的重要範疇》(《甘肅社會科學》1 期)指出,西王母作為以敦煌為中心的西部女神,是同東部帝王進行物質與精神交流的積極使者,在其被塑成的衆多形象中,寄寓著先民陰陽互補、東西相依、國家認同等價值觀念。張堡《論歷史原生態與生命原生態的敦煌生命哲學》(《甘肅社會科學》)指出,存在於人類文化史和人文中的敦煌哲學精神,在生命哲學向度與視域中,有獨特的歷史永恒意義,不僅其歷史原生態彰顯了生命哲學的具態現象學價值,而其生命原生態的意義仍然啓示、養育著人類的生命之流。

二、歷史地理

敦煌史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歸義軍史、地理交通、經濟史、秦漢簡牘研究等方面。

歸義軍史方面,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初版之再版。作者以揭示史實為主要目的,重點探討歸義軍的政治史和對外關係史,對 9 世紀後半期至 11 世紀前期近 200 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區歷史作了深入研究。李軍《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稱號問題再探》(《敦煌研究》4 期)認為張淮深在歸義軍內部並未自稱過“常侍”,而是曾使用與“常侍”相搭配的憲銜之簡稱“大夫”作為自己的稱號。乾符四年至中和元年間,張淮深先後獲得過散騎常侍、戶部尚書及兵部尚書等三次檢校官的晉升。光啓三年五月至九月間,張淮深開始在歸義軍內部使用“僕射”稱號。張淮深獲得的“司徒”贈官,當與索勛有關。雖

然歸義軍在張承奉時期一度不再使用“司徒”指代張淮深,但到了曹議金統治時期,張淮深的“司徒”稱號又得以恢復並沿用。杜海《曹元德稱司徒考》(《敦煌研究》4期)認為曹元德在長興四年(933)以節度副使檢校司空,935年曹元德出任歸義軍節度使後,未能順利地與中央王朝建立聯繫。939年,曹元德已以“司徒”自稱。曹元德去世後,940年沙州刺史曹元深繼任歸義軍節度使,任職之初號稱“司空”。曹元德的“太保”稱號是在其去世後中央王朝詔贈的。韓春平《敦煌金山國郊祀蠡測》(《敦煌學輯刊》3期)一文結合敦煌文獻與傳世文獻,認為金山國時期具備了舉行郊祀的多種有利條件,應該舉行過相關活動。

王使臻《曹元忠、曹延祿父子兩代與于闐政權的聯姻》(《敦煌學輯刊》2期)採用文獻細讀的方法,試圖將呈現碎片化的曹氏歸義軍政權曹元忠、曹延祿與于闐的聯姻線索,進行實證性的梳理,尤其是解釋了促成歸義軍與于闐聯姻的政治因素。杜海《敦煌歸義軍政權與沙州回鶻關係述論》(《敦煌學輯刊》4期)認為曹延祿時期的沙州回鶻與歸義軍關係良好;隨著沙州回鶻的壯大,曾一度參與歸義軍內政,支持曹宗壽推翻曹延祿的統治;但隨著曹氏歸義軍的衰落,沙州回鶻取而代之。張小剛、楊曉華、郭俊葉《于闐曹皇后畫像及生平事蹟考述》(《西域研究》1期)指出曹皇后在諸姊妹排行中至多排在第八,她於934年嫁給于闐國王李聖天,此後在于闐與敦煌兩地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歸義軍及其到于闐的使臣對她多有“宣問”,繼李聖天成爲于闐國王的從德太子即其親子。曹皇后晚年可能回到敦煌居住,其卒年難考,但在994年參加陰家宴會時,已經七十餘歲。

楊寶玉《〈張淮深碑〉作者再議》(《敦煌學輯刊》3期)認為敦煌文獻《救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碑》之作者爲張球,依據有四條:其一,抄寫該碑文的寫卷背面所存詩文當是張球所作,內容、筆蹟與正面相關,諸卷所抄爲張球作品集;其二,從張球任職及其與張淮深關係看,張淮深理應延請當時職掌“文辭之事”的節度判官張球撰寫碑文;其三,張球是虔誠的佛教徒,完全可以勝任爲張淮深的佛教功德作歌功頌德的撰寫;其四,碑文抄件中的大量雙行小注係張球爲晚年教授生徒而增補,內容常見於張球所刪《略出羈金》,同樣可證碑文爲張球所撰。張穩剛《敦煌文獻 P. 4064〈將軍論〉殘卷考釋——敦煌寫本兵書與歸義軍軍事研究之一》(《敦煌學輯刊》3期)在對 P. 4064《將軍論》進行錄校的基礎上,解析了其中蘊含的古代軍事材料。聶順新《張氏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內地諸州府國忌行香制度的差異及其原因初探》(《敦煌研究》6期)認為晚唐敦煌的國忌行香活動與內地諸州府相比,至少存在三點差異:國忌日數不同;國忌行香舉行地點不同;沙州的國忌行香活動允許士庶百姓參

加,內地則不允許。

有關敦煌地理、交通的考證方面,劉滿、關楠楠《左南城位置考辨》(《敦煌學輯刊》1 期)通過梳理古今學者對左南城位置的考訂,分析《水經注》等古籍文獻的記載,採用歷史文獻和地理測量相結合的方法,考證出左南城的位置。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周邊的交通問題是絲綢之路東段交通路線研究中的重要一環,吳炯炯、劉滿《也談炳靈寺石窟周邊的交通問題》(《敦煌研究》6 期)從四個方面對炳靈寺石窟周邊的交通問題做了詳細探討。王冀青《關於“絲綢之路”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 期)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探討了西方古典地理學家托勒密所著《地理志》中對“賽里斯之路”的記錄過程,以及近代英國東方學家玉爾所著《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對“賽里斯之路”的研究,指出上述記錄和研究是近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所著《中國》第一卷中創造“絲綢之路”一詞的學術基礎。

經濟史方面,蘇金花《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古代西部綠洲農業的灌溉特點——基於唐代沙州和西州的比較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6 期)指出,唐代西州和沙州兩地的綠洲農業充分利用各種水資源,修建了完備的水利灌溉系統,制定了嚴格的灌溉用水制度,設立了完善的水利管理機制。西州和沙州綠洲農業的灌溉受地形、氣候、水源等自然因素的制約,更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國家和地方政府在灌溉管理中佔主導地位。郝二旭《唐五代敦煌農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研究》(《敦煌學輯刊》2 期)指出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持續四百餘年的大規模農業開發,不僅蠶食了當地綠洲邊緣不可替代的具有防風固沙功能的天然植被,而且將幾乎全部的河流水源用於農業生產,使得當地生態用水嚴重短缺,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最終導致包括壽昌古城在內的大面積綠洲的沙漠化。趙貞《唐前期“中男”承擔差役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西域研究》1 期)依據傳世文獻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記載,認為中男可承擔征行、村正、曲長、侍丁、執衣、門夫、烽子、郡史等多種差役,但具體差配時往往還要考慮中男的身份特徵及家庭背景等因素。此外,太常寺司儀署及岳瀆齋郎由 16 歲以上中男充任,太史局中的天文生、曆生和卜筮生,通常也從那些有專門技藝特長的中男群體中選取。作為唐代徭役的組成部分,中男承擔的差役同樣享受“終服”之制。張新國《唐前期的女戶及相關問題——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 期)利用唐前期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女戶戶籍以及相關史料,探討了唐前期女戶戶主的特徵與稱謂、女戶的家庭架構、戶等、賦役以及受田情況等問題,認為唐前期的女戶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社會群體,女戶戶籍不僅有助於瞭解唐前期女戶家庭的真實面貌,而且相關研究也可補正史記載之不足。黃樓《闕氏高昌雜

差科帳研究——吐魯番洋海一號墓所出〈闕氏高昌永康年間供物、差役帳〉的再考察》(《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闕氏高昌雜差科分為供物、差役兩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時也徵用百姓驢、車等運輸工具,差役主要有燒炭、取楨、作瓠等。黑水城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潘潔、陳朝輝《黑水城文書中錢糧物的放支方式》(《敦煌研究》4 期)通過研究指出,黑水城文書中錢糧物的放支方式可歸納為該支、實支、正支、折支、添支五種。

秦漢簡牘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肩水金關漢簡》的校考和補正。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叁)〉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 期)就《肩水金關漢簡(叁)》中收錄的 20 枚殘損紀年簡、月朔有誤的簡以及曆譜簡進行校考。周艷濤《〈肩水金關漢簡(貳)〉釋文補正四則》(《敦煌研究》2 期)結合簡牘本身的行文習慣,通過漢簡材料的內部對比及與碑刻等其他材料的對比,從文字在簡文版式的位置、其本身構件的佈局、筆劃的走勢等方面,對原釋文的一處誤釋字予以糾正。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叁)曆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4 期)考釋了《肩水金關漢簡(叁)》的 6 枚紀年簡、13 枚曆譜散簡和 13 枚月朔簡的年代。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叁)〉中所見典籍簡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4 期)指出,《肩水金關漢簡(叁)》中出現的《論語》、《孝經》、《孟子》、《周易》、《左傳》等語句與傳世本有所不同,反映了西漢人以“經”治世的積極思想以及用“經”但不拘束於“經”的特殊態度。位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的肩水塞,是漢代“居延塞”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陶玉樂《漢代肩水塞的佈防特點及歷史價值》(《敦煌研究》3 期)認為,肩水塞在歷史上不僅是居延漢塞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軍事防禦體系,也是居延漢塞賴以存在的重要屯戍生活區。由於其地處要衝,佈防嚴密,因此是漢代軍事防禦體系建設的典範。孫聞博《河西漢塞“河渠卒”為“治渠卒”辨》(《敦煌研究》5 期)通過辨析居延漢簡、肩水金關漢簡史料,參以傳世文獻,指出傳統認識上的“河渠卒”似應定名為“治渠卒”,“治渠卒”主要在河西屯田地區從事水渠修築建設與水利工程維護。

三、社會文化

對於敦煌社會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敦煌大眾文化、婚姻與家庭生活、民俗信仰等多個方面。楊秀清《論唐宋時期敦煌文化的大眾化特徵》(《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認為唐宋時期敦煌大眾文化的價值取向直指民生,這成為唐宋時期敦煌地區長期相對穩定的文化原因。王使臻《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文書教育》(《陝西理工學院學報》4 期)認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文化教育表現出一種精英教育為輔、實用主義教育為主的特色。一方面歸義軍政

權有意識地加強對中原傳統精英文化的繼承與學習,吸納中原及敦煌本土的精英進入歸義軍政權,這些文化精英對敦煌地區的文書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另一方面,歸義軍政權在敦煌地區實行的文化教育,仍以實用性教育為主,尤其以服務於歸義軍政權的文書教育為最突出的特徵表現。

婚姻與家庭生活方面,買小英《敦煌願文中的家庭倫理管窺》(《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敦煌願文中留存的反映古代敦煌民衆家庭倫理關係的文書,體現了敦煌地區民衆在處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師徒等關係時所遵循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範。買小英《論敦煌佛教家庭倫理中的行孝方式》(《敦煌研究》3期)認為,古代敦煌地區的佛教信衆在實踐家庭倫理、處理父母與子女、現世與來世之間關係的過程中,遵循著佛教家庭倫理中父慈子孝、知恩報恩的基本倫理關係,並將其作為佛教信仰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石小英《唐五代宋初婚姻開放性初探——以敦煌婦女為中心考察》(《敦煌學輯刊》4期)依據豐富的敦煌文獻所載相關敦煌婦女的材料,對唐五代宋初婚姻開放性的表現及其原因進行系統探討。宋翔《唐宋時期沙州的城市形態與居住空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期)指出,作為當地居民主要聚居地的沙州城有子城、羅城之分,子城位於地勢較高的西南隅,以便於控禦與防守,其內設有衙署等建築,羅城則主要分佈著坊市以及寺觀。祁曉慶《敦煌壁畫婚禮圖中的鏡》(《敦煌研究》6期)對敦煌石窟壁畫婚禮圖中的鏡子圖像進行了分析,認為鏡子是當地婚禮儀俗中的常用之物,具有辟邪的功用,也可作為神聖之物,供新婚夫婦在婚禮儀式中加以參拜。鏡子象徵著夫婦同心,表達了對新人的美好祝願。

民俗信仰方面,何劍平《論〈維摩詰經〉在中國中古庶民階層中的信仰特質》(《甘肅社會科學》6期)一文重點考察了《維摩詰經》在中國中古庶民信仰中的演進特質,認為《維摩詰經》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士大夫和普通民衆兩個文化世界,這種傳播過程中產生的信仰差別,主要源於其教理本身內涵的豐富性,以及因其化他利物、隨物根緣的目的顯示出的隨衆生不同而施教的特性。梁麗玲《敦煌文獻中的孕產習俗與佛教信仰》(《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通過梳理佛典、《講經文》、佛曲歌贊等材料,結合敦煌文獻中與孕產有關的《難月文》、經咒符印等,說明懷孕期間之憂苦煩惱、屆臨難月至祈神保護、免除產難之經咒符印的情況。趙玉平《唐五代敦煌蠶神考——以敦煌文獻 S. 5639〈蠶延願文〉為中心》(《敦煌學輯刊》3期)從民俗學的角度對 S. 5639《蠶延願文》中的十位蠶神進行考察,從中探究敦煌佛教信仰民俗化的發生模式,即敦煌佛教信仰的民俗化是以佛教思維方法來解讀中國傳統文化。李瑞哲《對“圖像程序”的重新認識——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圖像所表現的共同主

題》(《敦煌學輯刊》1 期)認為粟特人墓葬的圍屏石榻與石槨壁上的雕刻圖案以表現宴飲、狩獵、出行的場面居多,出行圖、宴飲圖是粟特人墓葬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能夠反映入華粟特人宗教信仰、精神與物質生活等方面的真實情況。

四、宗 教

本年度宗教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涉及佛教、道教、景教和摩尼教。

佛教研究包括佛教文獻整理與考釋、佛教信仰與儀軌探討、敦煌佛教教團及僧尼的社會生活等。

敦煌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考釋方面,張小艷《敦煌本〈衆經要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在校錄文本的基礎上,對《衆經要攬》進行了正名解題、印經考察、抄寫年代等問題的考探;還從文獻校勘、輯佚、證源和寫本校改的層次性上對其研究價值作了論述。《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為漢譯佛教典籍,早佚。王孟《談敦煌遺書〈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的研究》(《敦煌研究》4 期)對敦煌遺書《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研究史進行評述,進而對該經今後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觀點。廖暘《〈大威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文本研究》(《敦煌研究》4 期)首先指出《大威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是一種未入藏的熾盛光陀羅尼經,接著概括了現存唐至明時期藏外經寫本、刻本的情況,並探析了該經從中唐到明代的寫本內容和時代特徵。郭麗英《六世紀上半葉敦煌寫本〈大方等陀羅尼經〉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以一部懺悔滅罪禮儀所依據的重要經典,而且是漢傳佛經中最早的陀羅尼經為例,證明某些敦煌佛經正本抄經對我們研究經典成立、翻譯過程和當地人的佛教信仰互動有非常珍貴的意義。何瑩、張總《敦煌寫本〈千手經〉與〈大悲啓請〉》(《敦煌學輯刊》4 期)介紹了敦煌寫本《千手經》與《大悲啓請》的詳細情況,注意到其開首“仰啓月輪觀自在”句,對於瞭解水月觀音與千手觀音的關係,水月與密宗觀音的關聯,即水月觀音的真正緣起有啓發作用。

黃京《〈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成書年代與作者等相關問題考論》(《敦煌研究》2 期)指出目前所見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的寫本有三十餘件,漢文版本達七種。作者根據其中所反映的官名、地名,初步推斷出該傳的成書時間為公元 685 年至 765 年,並根據其所反映的社會風俗和制度情況,進一步推論該傳的作者可能是鄭愔,成書年代可具體為公元 709 年至 710 年。方廣錫《偽敦煌遺書〈般若波羅蜜菩薩教化經〉考》(《敦煌研究》3 期)從文獻內容、所謂李盛鐸題跋兩個方面,考證北京瀚海拍賣有限公司“2007 年春季拍賣會”出現的《般若波羅蜜菩薩教化經》乃現代人偽造的贗品。張總《〈十王經〉新

材料與研考轉遷》(《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一文,作者把近年來新發現的有關《十王經》的材料進行匯總研究,涉及浙江、陝西、四川、山西等地,研究視野大有擴展。鄭阿財《〈佛頂心大陀羅尼經〉在漢字文化圈的傳布》(《敦煌學輯刊》3 期)以《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為例,借鑒“傳播學派”、“歷史地理學派”等理論和方法,考察其在漢字文化圈的傳布及相關問題。彭瑞花《惠真與敦煌本〈佛說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及其他律學行蹟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3 期)根據李華撰《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對惠真的律學行蹟加以考證,論證了敦煌本《佛說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為惠真編寫並流傳於世,並探討了他在不同時期所研習弘揚的不同戒律和主要律學思想,以及作為天台宗玉泉系第六代傳人的廣泛社會影響。王惠民《P. 2550〈略說禪師本末〉所反映的三階教實踐活動》(《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圍繞《禪師本末》所反映的三階教教徒的宗教活動進行論述,並結合其他文獻討論三階院的結構與功能,為後來三階教遭到禁斷提供了詳細的背景資料。張先堂《中國古代的溫室浴僧供養活動——以唐宋時期敦煌文獻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在對敦煌研究院藏 218 號文書進行釋錄的基礎上,對該文書進行定名和定性,但並未解決斷代問題。

文本綴合可使原本分裂的殘卷得以團聚一處,綴合後的寫本顯示的信息較為完整。張涌泉、劉溪《古代寫經修復綴接釋例——以國圖藏〈佛名經〉敦煌寫卷為中心》(《宗教學研究》4 期)以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佛名經》為中心,通過內容、行款、書風、書蹟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從殘損補綴例、脫誤補綴例、綴接錯亂例、綴接顛倒例四個方面探討了前人的修復綴接工作以及與之相關的誤綴現象,說明殘損、撕裂古寫本的修復綴接古已有之,古人的修復綴接也未必完全正確。張涌泉、徐鍵《〈瑜伽師地論〉系列敦煌殘卷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3 期)將 26 號殘卷或殘片綴合為 11 組。張涌泉、胡方方《敦煌本〈四分律〉殘卷綴合研究》(《浙江社會科學》6 期)將 16 號《四分律》綴合為 7 組。張小艷《敦煌本〈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衆生苦難經〉殘卷綴合研究》(《復旦學報》6 期)將其中的 14 號殘卷綴合為 7 組。張小艷、傅及斯《敦煌本唐譯“八十華嚴”殘卷綴合研究》(《浙江社會科學》6 期)將 26 號殘卷綴合為 9 組。張小艷《敦煌本〈父母恩重經〉殘卷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3 期)將敦煌本《父母恩重經》寫經 26 號殘卷綴合為 8 組。張涌泉、朱若溪《俄藏〈金光明經〉敦煌殘卷綴合研究》(《復旦學報》6 期)將 37 號俄藏《金光明經》殘卷綴合為 11 組。

張小艷《敦煌疑偽經四種殘卷綴合研究》(《宗教學研究》4 期)通過殘字拼合、內容接續、行款相同、字蹟書風相近等角度的比較分析,將《究竟大悲

經》、《善惡因果經》、《大辯邪正經》、《易算經》等四種疑偽經中的 24 號殘卷綴合爲 9 組。張磊、郭曉燕《俄藏楷書〈大智度論〉寫本殘片綴合研究》(《復旦學報》6 期)將 26 號楷書《大智度論》殘片綴合爲 12 組。張磊、胡方方《國圖藏敦煌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殘卷綴合研究》(《宗教學研究》4 期)將國家圖書館所藏的 26 號《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殘卷綴合爲 10 組。張磊、劉溪《國圖藏敦煌本〈佛名經〉殘卷綴合示例》(《浙江社會科學》6 期)將國家圖書館藏的 14 號《佛說佛名經》綴合爲 1 件,定作二十卷本《佛說佛名經》卷三。張磊、左麗萍《俄藏敦煌文獻〈大乘無量壽經〉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3 期)將俄藏 29 號殘卷綴合爲 16 組。張磊、郭曉燕《敦煌寫本〈大智度論〉殘卷綴合研究》(《中國俗文化研究》1 期)將 18 號殘卷綴合爲 7 組。張涌泉、陳琳《敦煌本〈佛說阿彌陀經〉殘卷綴合研究——以中、俄、法三國館藏爲中心》(《中國俗文化研究》1 期)把 45 號殘卷綴合爲 20 組。

佛教信仰與儀軌的探討方面,陳大爲《中古時期敦煌佛教的特點探析》(《石河子大學學報》4 期)認爲中古時期敦煌佛教有其自身的發展脈絡,有別於正統佛教,具有社會化、平民化和兼容性三個方面的特點,這對深入認識和瞭解古代敦煌佛教文化意義重大。姚崇新《淨土的嚮往還是現世的希冀?——中古中國藥師信仰內涵再考察》(《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試圖揭示中國藥師信仰的實質:當時的中國人更看重藥師佛的現世拯救功能,藥師崇拜更多是基於現世利益的考慮,因此認爲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將《藥師變》直接等同於《藥師淨土變》的思維定式。劉艷燕、吳軍《莫高窟禮佛儀式的左旋與右旋》(《敦煌研究》6 期)對莫高窟古代佛教信徒禮佛所遵循的旋繞禮佛方式進行了探討,認爲古代佛教信徒旋繞禮佛遵循了以至尊佛爲準的右旋禮佛儀軌。董大學《〈金剛經〉的儀式化——〈銷釋金剛經科儀〉相關寫本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4 期)對浙敦 069、浙敦 102、浙敦 103 和俄藏 284 四件寫本進行了研究,認爲它們屬於同一寫本,可擬名作《銷釋金剛科儀要偈三十二分》,內容與《銷釋金剛經科儀》相關。因其抄寫年代在宋元之間,應不屬於敦煌文獻的範疇。

敦煌佛教教團及僧尼的社會生活方面,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戒律清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認爲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主要體現在佛教戒律的演變和清規的制定上,敦煌佛教戒律的演變和清規的制定有其自身的原因和特色,同時與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陳雙印、張鬱萍《晚唐五代敦煌僧人在中西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敦煌學輯刊》4 期)通過對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梳理,認爲這一時期的敦煌僧人會利用出使于闐、西州和敦煌南山以及張掖甘州回鶻政權的機會,從事經商牟利,

從而在這一時期的東西經濟交流中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霍巍《荒漠青燈苦行僧——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發掘所見僧侶生活》(《歷史教學》12 期)重點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的禪窟、僧房窟、瘞窟等三種類型石窟的考古發掘情況及其反映出的僧侶生活進行了闡述。

道教方面,楊秀清《唐宋時期敦煌道教大衆化的特徵——以敦煌文獻爲中心的研究》(《敦煌研究》2 期)通過對敦煌藏經洞出土道教文獻的研究,分析出唐宋時期敦煌大衆道教思想四個方面的特徵。楊秀清《唐宋時期敦煌大衆的道教知識與思想——以敦煌文獻爲中心的研究》(《敦煌研究》3 期)認爲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主流文化是大衆文化,在這一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社會生活中,影響敦煌大衆價值觀念和行爲方式的是大衆的自然知識與思想。陳魏俊《敦煌文書“行散”非“行解”淺說——兼與張儂等先生商榷》(《敦煌研究》2 期)認爲敦煌文書中所記載的道家服石“行散”之法與出土醫學竹簡所記“行解”意義完全不同,前者指散步行藥,後者指發汗解表。劉永明《歸義軍時期的敦煌道教文獻與齋醮法事活動》(《敦煌學輯刊》4 期)首先對歸義軍時期的敦煌道經寫卷和其他道教文獻進行進一步考察和時代辨析,補充了幾件以前學者未曾收錄的道教文獻;其次對歸義軍時期的齋醮法事活動進行考察,以便讀者對歸義軍時期的道教狀況有更深入瞭解。

道教經典的考釋方面,王卡《敦煌本〈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校讀記》(《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對新近公布的幾件敦煌道經寫本經名加以考定,並校讀文本,附錄與《道藏》本校訂以後的寫本釋文。劉屹《論古靈寶經的神話時間模式——以新經和舊經中“劫”字的使用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通過對比“新經”與“舊經”對“劫”字的使用和理解,揭示出“新經”與“舊經”關於時間模式的異同,並以此爲基礎,討論有關古靈寶經研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郇同麟《〈太上洞玄靈寶天尊名〉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15 卷)認爲大淵忍爾所著錄的四件《太上洞玄靈寶天尊名》寫卷本爲一卷,即該經上卷,全經應有三卷。該經上卷僅北方、東方兩方天尊,全經十方天尊應依北方、東北、東方、東南、南方、西南、西方、西北、上方、下方的次序,各方應有四組左右的天尊,每組五十個天尊左右,總數應與伯 3755 所說的“千五百”相合。謝明《國圖敦煌道經校釋劄記》(《敦煌研究》2 期)摘取國圖藏敦煌道經中的一些條目進行解讀,解釋了其中的語詞,並通過釋義來校正敦煌道經寫卷和《道藏》各自的錯誤。

景教、摩尼教研究主要集中於文獻的考釋和比較,但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王蘭平《日本杏雨書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寫本〈志玄安樂經〉釋考》(《敦煌學輯刊》2 期)根據日本杏雨書屋刊布的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